

他是天才，也是疯子，
他更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荷兰〕肯·威尔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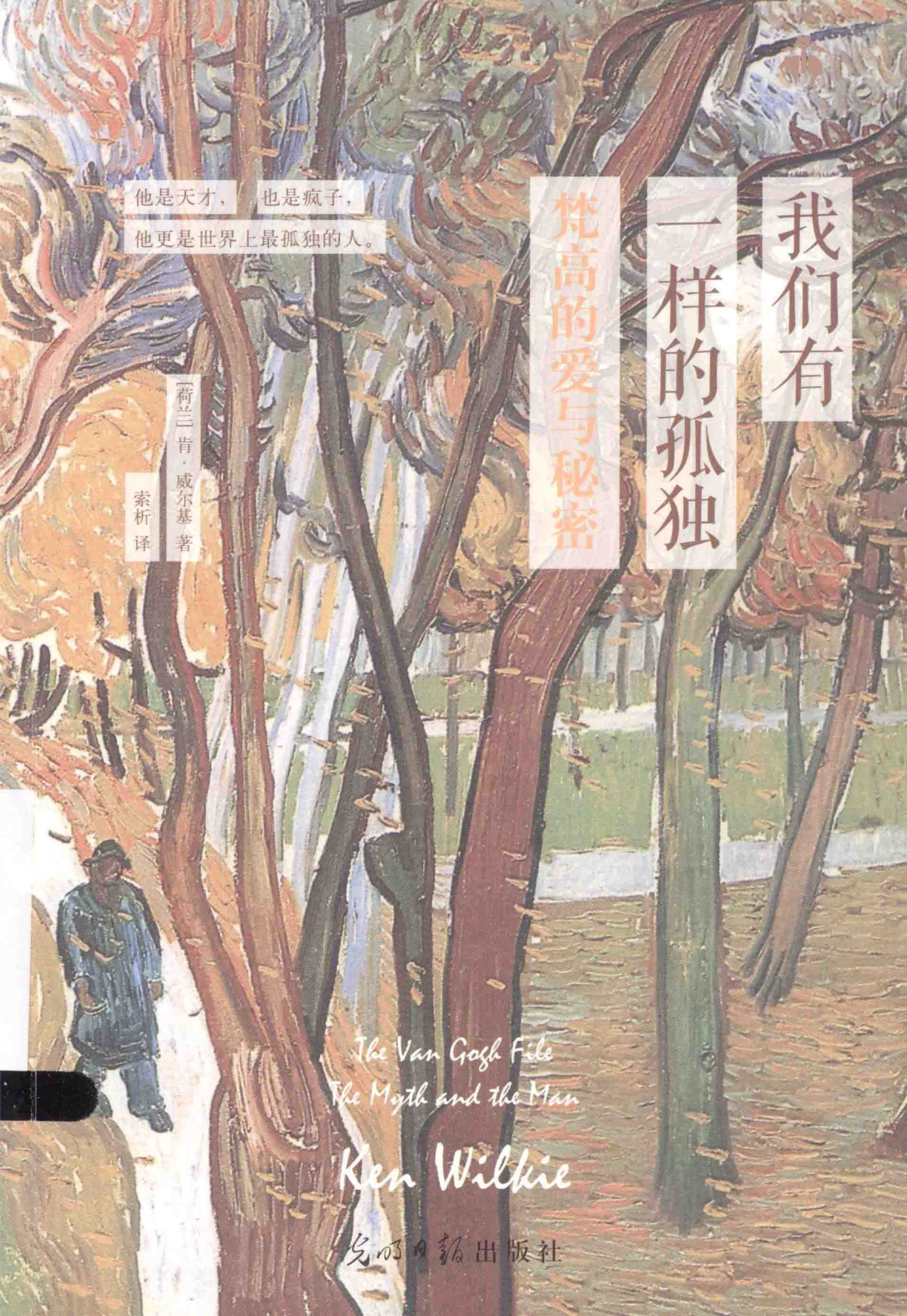
索析 译

我们有 一样的孤独 梵高的爱与秘密

*The Van Gogh File
The Myth and the Man*

Ken Wilkie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们有一样的孤独

梵高的爱与秘密

〔荷兰〕肯·威尔基 著 索析 译

*The Van Gogh File
The Myth and the Man*

Ken Wilkie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有一样的孤独：梵高的爱和秘密 / (荷) 威尔基 (Wilkie, K.) 著；索析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112-5640-9

I. ①我… II. ①威… ②索… III. ①梵高，
V. (1853~1890) —生平事迹 IV. ①K835.63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541号

版权登记号：01-2013-8969

Copyright © 1978, 1990, 2004 by Ken Wilkie

Copyright licensed by Sourenir Pres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我们有一样的孤独：梵高的爱和秘密

著 者：[荷] 威尔基 (Wilkie, K.) 译 者：索 析

责任编辑：王 娟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韩 捷

责任印制：曹 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8（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wj_gm2013@163.com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7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5640-9

定 价：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旅行以及艺术家的生活，一直都是我写作生涯的中心。我早期的作品履历中包括伦勃朗·范·莱因、皮特·蒙德里安、M.C.埃舍尔以及威廉·德·库宁等人的写作，而在为写作而调查花在路上的时间和翻阅参考书的时间几乎相差无几。20世纪70年代，我接受了一项任务，这个任务使我比从前任何的冒险都更深入、走得更远，我在这之中不仅探索着我研究的主题，更探索着我自己。恰巧又一次，我正专心投入的写作，是关于汤姆·沃尔夫、盖伊·塔利斯、亨特·S.汤普森、杜鲁门·卡波特、查理斯·狄更斯等一些作家的，对这些人而言，他们的写实主义都根植于情感纠纷中，无论是否虚构，都有着强有力的文风。我同时也很欣赏像斯蒂芬·里柯克、罗伯特·本奇利、迪兰·托马斯、斯派克·米利甘和艾伦·科伦这样的幽默作家。

我工作的《荷兰先驱》杂志的编辑邀请我写一些关于著名画家文森特·梵高的特写报道。这篇文章出版的时间恰巧正逢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开幕，展览的核心是上百幅由工程师文森特·梵高博士（大画家的侄子，同时也是文森特的兄弟提奥的儿子）卖给荷兰政府的画作。

1890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文森特就画了一幅在淡蓝色的天空下盛开的杏仁枝，这是一幅充满浪漫色彩的画作。

我着手开启的这段旅程，常常始料未及地将我引进文森特·梵高穷困潦倒的秘密起源，这段旅程慢慢变得超越了最初撰写杂志专栏的界限。我追寻了整个欧洲，寻觅那些和梵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们——从荷兰南部的一位老磨坊主，到安特卫普的一名医生以及文森特在伦敦时的初恋情人的子嗣们。我的探寻需要花费数小时去打一些枯燥无聊的电话，要驱车或者火车长途跋涉，还有无数个无眠的夜晚，而这一切却为一些人的生活带去了奇妙的闪光，这些人在此之前甚至从未知晓自己会与伟大的画家有着这般的关联。我被牵涉进了一些艰难的采访中，采访主要围绕着梵高和他的兄弟提奥的一些忌讳的信息，发现了来源于私生子们的颇有争议性的论辞，我甚至发现自己为了一探照片的真相，闯进了精神病院。

我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这个男人吸引，这个一生都被不幸顽强追随的男人；这个一辈子都想努力和一个女人建立长久的情感关系、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的男人；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断失败，继而将失败转为沮丧，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对宗教的狂热投入中，然后是艺术中，用最为精致的语言和图像表达了他内心最深处的绝望，最终获得了永恒的成功。不管是在文森特写的信里，还是他的画中，你都能强烈地感觉到他的个性跃然纸上，有着人性和本质最强烈的表现。

这趟旅程，至少现在看上去并没有所谓真正的结束。写这本书纯粹出于我的直觉。无论我是在英国追寻梵高的脚步，还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或在埃及追寻福楼拜，我都是跟随着自己的直觉前进：这趟旅程慢慢变成了一场冒险，引领我沿着不断变化的岔路，不断追寻为我带来新的意料之外的小发现。我甚至不可能为这本书分类。我只能引述格鲁乔·马克思的话，无论如何，我永不会成为某一个接纳我为其中一员的组织中的一员。（我永不愿受既定的形式和规则所束缚。）

我以我所做过的事情，写了这个故事，因为这就是我的方式。而我真诚希望，在我的这场追寻之旅中所体验到的某种热情与兴奋，能够与读者一起分享。

肯·威尔基

2003年10月

序言——¹

1. 出发——¹
2. 爱在罗耶尔家——²₇
3. 煤井里的耶稣——⁶₇
4. 与苦艾酒为伴——⁸₁
5. 疗养院——⁹₆
6. 苏格兰人在巴黎——¹⁰₉
7. 黄花——¹²₂
8. 阿姆斯特丹的截稿日——¹³₂
9. 兄弟和医生——¹⁴₆
10. 被遗忘的外甥女——¹⁷₆
11. 小威廉姆——¹⁸₆
12. 深入挖掘——²¹₉
13. 曼哈顿男人——²⁴₂
14. 布雷达的盒子——²⁴₅
15. 布卢姆斯伯里的日子——²⁵₀

1972年1月，一个结冰的早晨，我醒来，发现自己正脸朝上躺在运河边的一条狭窄的小路中间，身子卡在了我的自行车轮与一个美国游客的腿边。

那天早上，我睡眼朦胧地踩上脚踏车赶去上班，他突然从我身后的一棵树后面跑了出来。

“不好意思。”我们几乎是同时开口。我在内心里偷偷诅咒了一秒钟之后，开了个了无生趣的玩笑，试图缓和一下眼前这闹剧般的情景。等我们之间的尴尬被解除后（有些艰难而缓慢），他说：“我在找梵高博物馆。你知不知道它是否就在这附近？”

“什么博物馆？”我晕晕乎乎，脑袋里一溜烟地闪过“走……停……绿灯……红灯……红灯区……红……血！”等字眼。血像涓涓细流，从他鼻子里缓缓冒出来，在他的小胡子上形成了一丝丝红色的冰珠。他是不是撞坏了脑袋？他刚才是想说交通博物馆吗？

他重复了一遍，“你知道，梵高，就是那个把自己的耳朵给割了的……那个画家。”声音里有一些不耐烦。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发音的问题。

“哦，不好意思……你是指文森特·梵高吧？”（“G”在荷兰人的发音中很像是“ch”在苏格兰语中的“loch”。）

“对对，就是他。你终于明白了。”美国人好像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意外事故。他笑起来的时候样子挺随和友善的。不管怎样，现在是一大清早，实在是让人脾气好不起来的时候，何况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在这个时候被一个蓬头垢面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全速前进的脚踏车给撞翻。

“你确定你没事吗？”我问。我觉得是时候，我们中得有人说说这个了。“你刚才头撞得不轻啊！好像有肿块。”

“我没事儿。肿块？哦，那是我的鼻子……”随后，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一旁过路的汽车喇叭声开始打破这早晨的宁静。我们以《劳雷尔和哈代》中怀旧的方式站在路中央，完全没意识到自己阻碍了交通。

“你呢？”我们一边朝路边挪步，他一边问我。

“这倒是提醒了我，”我回答，“我要学会适应阿姆斯特丹的始料未及，你会在每一个转角遇见意外。要知道，没这些意外，就不算是阿姆斯特丹的清晨了。”

我们一起站在空旷的路边，我第一次开始注意这个男人的长相。他又高又瘦，穿着条紧身牛仔裤和一件高领套头毛衫。除了胡子上血红色的“石钟乳”，他身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他的眼睛里有种奇怪的光芒，当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光芒是什么：每当他谈起梵高，眼神中就会有种温和的守规矩的狂热劲儿。他告诉我他是学精神病的，业余时间也会画画，他这次来阿姆斯特丹主要就是为了参观梵高博物馆。

我真不想看他失望的样子，但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他，这个时候，他能在梵高博物馆里看到的只是奠基状态，梵高的绘画作品还被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里面，紧挨着美术馆广场。但他说，这不要紧，能看到一些绘画作品也行。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些画。

既然我去上班的路上也会经过博物馆广场，我就提出可以骑车载他

一程。他的眼中有一丝压抑的恐惧，连忙说，他更愿意自己散步过去。于是我给他详细指路后就与他道了别。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男人谈论起梵高时眼神里的狂热和着迷。而在那之后，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些与这位画家有关联的人们身上看到这相似的狂热。这同样的眼神，梵高自己一定很容易认得出来。当我继续骑车前行的时候，我一直在沉思这位画家神奇的力量。那次事件点燃了我的好奇心。

等到博物馆广场上的番红花都谢了，梵高博物馆才真正开始初具模型，巨大的水泥立方体结构在树丛中缓缓竖起来，这是著名的“德斯特尔抽象画派”建筑设计师里特维德^①于去世前不久设计的。这个坚挺的多角建筑物，既是用来存放一位热情的后印象派画家的600幅伟大作品，更令人想到了蒙德里安的纪念馆。

春天过去，夏天渐近，文森特·梵高的名字，几个巨大的白色字母开始出现在建筑物的表面。我开始越来越习惯看到他的名字在那一堆钢筋水泥中间的样子，这似乎是在提醒我，我对这位画家的了解还少得可怜。

几年前，当我住在苏格兰高地的一座小村舍里的时候，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书，是梵高写给他弟弟提奥的书信集。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是如何被他们那璀璨的人性所深深震撼，还有那字里行间清晰的表达和激烈的情感。在那之后，当我骑车行驶在普罗旺斯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会不断想起梵高对于这片风景的描述。但现在，我就住在梵高的故乡，每天清晨都会骑车经过刻有他名字的水泥墙。

博物馆要到明年三月才会正式开放，加上之前的巧遇，一个关于梵高一生的故事在我脑海中酝酿，这似乎是对《荷兰先驱》的一个很好的提议。我和我的主编弗农·伦纳德提到了这个选题，他也表示同意。当

^① Gerrit Thomas Rietveld, 1888—1964, 吉瑞特·托马斯·里特维德。

我们在讨论这篇文章应该以什么线索来构建的时候，他提议我可以尝试着追随梵高的脚步——访问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看看我能不能发现点儿什么。这想法听起来很不错，和我几个月前刚完成的一篇关于画家蒙德里安的文章的做法很像。我对于这类关于画家的文章也不算是个新手了。在我调查蒙德里安的过程中，我就找到了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段旧时的火花——我的女房东。

对于这篇关于梵高的作业，弗农给了我1500盾^①，让我用三个礼拜来做这项调查。而这个数字是基于一条火车线的车票总和所得出的：阿姆斯特丹—艾恩德霍芬—尼厄嫩—艾恩德霍芬—蒂尔堡—布雷达—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奥斯坦德—多佛—加来—蒙斯—巴黎—阿尔勒—巴黎—阿姆斯特丹，整个行程大概需要450盾，外加两个礼拜每天的开支预算是75盾。没有什么特殊的目标，也没有具体的简介，只有一本记事本，还有一台相机。

即便按照行程表来走，这两周里，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在火车或地铁站里度过。梵高在世的37年里，他一共在荷兰、英国、比利时以及法国的22个不同的地方生活过。我很快就发现，在有限的两周旅行时间里，我根本无法走访梵高住过的每一个地方。我必须要精心计算我的时间，在欧洲地图上做出我的规划。而且，鉴于火车旅行可能会有些不太灵活，我决定带上我自己的车。但即便那样，我也还是不可能在两周内走访梵高住过的每一个地方。

首先，我想要见一见和这座梵高博物馆有关的人。1972年，梵高的家庭档案被暂时保存在洪特霍斯特街上的一间小小办公室里，就位于博物馆广场外的一条小巷子里。某天早晨，我到达那里，自我介绍了一番后，便得到了那里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莉莉·库贝·尚波勒、李欧吉·范·利文和博物馆馆长埃米尔·梅耶尔。他们的梦想就是把这

① 荷兰货币单位，折合约375英镑。

座梵高博物馆经营成一个鲜活的概念——不只是一座展示梵高最大部分作品的博物馆，不只是一个供学生和学者们前来学习研究梵高的最大中心，还是一个人们可以直接从街头进进出出直接拿起画笔刷子开始绘画的地方。

那里每一个和我谈话的人都对我的这项任务很感兴趣，还有一些人甚至会停下工作来帮助我。

莉莉·库贝·尚波勒借给我一本关于梵高生平和作品的完整研究手册，这份文件的作者是马克·艾德·楚波特博士。“楚波特博士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法国南部，”莉莉对我说，“他在莫桑有一座房子，就靠近阿尔勒。我会把房子的地址给你，等你去了伦敦，你或许会有兴趣去见一下保罗·查尔克劳夫特。他是个邮递员，去年还来这里见过我们。业余时间里，他也会画画，而且他完全被梵高的作品所激励和鼓舞着。他也在对梵高在伦敦的生活做一些研究。”我记下了查尔克劳夫特的名字。

随后，莉莉又带我参观了档案室，在那里，有很多关于梵高的背景资料等着我去阅读。我的面前陈列着整整一书架关于梵高研究的书：精神病学的研究、一排排的艺术评论作品、简短的传记。起初我感觉一片混乱和迷茫——我可以花上三周的时间坐在这里阅读，都不用离开阿姆斯特丹。另外，关于梵高生平的研究显然已经非常多了，我不可能再发现什么更有趣的东西，更别提什么创新了。但是，当我一页一页翻阅一卷一卷的档案夹时，我意识到，还有远比我之前所期待的更多的关于梵高的事情，等着有人去进一步挖掘。关于这位画家的人生部分似乎都只是被很浅显地定位了而已。他在巴黎、伦敦和比利时的那些年却都被他之后在阿尔勒的日子所遮蔽了。

我迅速做了笔记：在英国房东的女儿拒绝了他。导致他后来趋向于传教。子嗣？照片？巴黎——极少的信件。很多是和提奥以及安德里斯·邦格住一起时的。

我正咽下手中的第四杯咖啡，盯着一幅梵高的自画像看，这时，门被打开了。我缓缓抬起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含糊地打了声招呼。门口站着一位头发初白的老人，穿着一身整齐的黑色西装，打着条纹蝴蝶领结。他看上去相当引人注目，就和我眼前书页上的这些面孔一样。

“梵高。”他边说，边朝我伸出手来。这是否是个暗号？我猜想。随后我才想起来，荷兰人都是这样一边与人握手，一边报上自己名字，介绍自己的。我赶忙握住他伸过来的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自己的名字，“威尔基。”

莉莉正站在一旁，可能注意到了我脸上迷茫的神情，赶紧上前向我介绍——他就是与文森特·梵高同名的侄子，文森特·威廉姆·梵高博士，博物馆里每个人都叫他“工程师”梵高。他那高高的前额，还有罗马式的鼻子，显然，比起他父亲提奥，梵高博士长得更像他叔叔。文森



提奥的儿子，工程师文森特·梵高博士，1973年。（照片来源：作者）

特挚爱的兄弟继承了梵高许许多多的绘画作品。当梵高将“工程师”抱在手臂中的时候，他才只有1岁。两个月后，也就是1890年的7月，梵高就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工程师”83岁了，就站在我身旁。他看上去似乎很健谈，于是我适时地问他，和他叔叔文森特留下的200幅绘画和400张图片一起长大是什么感觉？我们面对面坐下，他用一种颇为正式的口吻回答我，“我们的房子里堆满了那些画——床底下，柜子顶上，浴室底下，当然还有墙上。我父亲把它们全部都保存了下来。尽管梵高在世的时候，他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他始终坚信，总有一天，梵高对于艺术界而言，将会像贝多芬对于音乐界而言一样的重要。当我父亲离世后（就在梵高死后6个月），这些收藏的画就转到了我母亲乔安娜·梵高-邦格手中，之后才传给了我。”

邦格……我好像刚读到过这个名字。我在笔记本写下这个名字，并特地将它圈了出来。

直到1962年为止，这些收藏品都属于梵高博士的私有财产，没多久，在荷兰政府的建议下，一个基金会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主席就是梵高博士。国家补贴给基金会550万美元，用以购买梵高的全部作品，并提供津贴，保障工程师的子嗣们的生活。除此之外，政府还许诺会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广场上，为这些收藏作品建造一座特殊的建筑，也就是后来的梵高博物馆。

1966年，梵高博士作为一名顾问工程师，光荣退休了，现居住在拉伦的一座茅草公馆里，就在距离阿姆斯特丹往东15英里的一个村子里。

我问他，作为梵高的侄子，这个身份是否对他的私人生活有所影响？

“一点都没有。工作上，我打交道的人大多是一些实业家，他们对绘画通常没什么兴趣。但是你知道，发生在梵高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只是程度比较轻微而已。今天，他之所以会如此被认可，一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开始理解自己身上的事情也有与梵高共通的地方。

当你读完他的信之后，你会发生改变。他是如此丰富多彩。”

之后，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会和梵高博士再次谈到一些关于他们家庭的、还不为世界所知道的事情。现在，我开始觉得邦格这个名字有些熟悉了。工程师的母亲叫乔安娜·梵高-邦格。而邦格曾是一个男人的姓，梵高和提奥在巴黎时都和那个男人住在一起过。我问起工程师关于这段有些迷离的小插曲。

“文森特在巴黎的生活……我发现这段生活似乎不太为人所知？”

“没错，”工程师回答道，“你看，那时候他大多时间都和提奥住在一起，所以也就没有写那么多信了。”

“您之前提到过邦格这个名字。这是您母亲自己的名字吗？”

“是的。”

“您母亲和安德里斯·邦格——1886年时和提奥以及梵高一起住在巴黎的那个人有关系吗？”

“是呀！我妈妈就是安德里斯·邦格的妹妹。”

“这位邦格过世了吗？”

“是的。”

“他结过婚吗？”

“是的，两次。”

“他的妻子中有人还活着吗？”

“第二任妻子，弗朗索瓦丝还在。”

“您知道她住哪儿吗？她会愿意见见我吗？”

“当然，她住在东边的阿尔曼，我肯定她会愿意和你聊聊的。但我怀疑她对巴黎那段时期了解多少，那毕竟是在她认识安德里斯之前的事情了。”

我决定立即就给弗朗索瓦丝打电话，即使成功的希望比较渺茫，但这毕竟是个开始，而邦格也一定会对他妻子讲过一些他在巴黎的事情的。

莉莉把我带到一间屋子，我可以在那里找到电话号码簿，并有交谈的私人空间。那里的亚曼人名地址簿上列着弗朗索瓦丝·邦格，范·德·波希·维若德男爵夫人——可真是一个又长又拗口的名字啊！

我按照地址簿上的号码，拨通电话，一个温柔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我确认这就是男爵夫人，于是我向她解释了自己的来由。

“好吧，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我的回忆感兴趣。”她回答。但她依然邀请我隔天到她家中拜访。

我充满期待地放下电话，我找到一个女人，她丈夫认识梵高，还曾经和梵高住在一起。而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刚和一位在婴儿时期曾被画家梵高抱在怀中的男人聊过。而在这之前，我甚至都没想过自己能找到曾和梵高有过接触的人。这些人使得梵高似乎离我们不那么遥远了。这些人，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分享着和他活着时的联系。想着可能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很多人存在，我决定不在这文学的海洋中尝试寻找关于梵高的资料了，而是专注在人身上。不过我还是感谢即将落成的梵高博物馆里的每位热心提供我帮助的人。

“我会在旅途中自己拍照的，”我对馆长埃米尔·梅耶尔说，“但我还能借用你们档案中的一些照片来配我的文章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但你自己都不能想象会带些什么东西回来，是吧？”

“那是。”我说，满心期待着能带回一些除了皱巴巴的地图之外的其他东西。

我走到外面，停下来观看一些工人们在组装楼梯间，羡慕他们做着自己的工作时严谨的逻辑：一块一块，一片一片。我希望自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于是，我开始尝试着整合思绪。我仍旧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但至少有了个开头。文森特最后一次离开荷兰是1884年，所以，任何一个还活着的、认识文森特的人，那时候也只可能是一个孩子，而且到了1972年，他们也都已经是年逾百岁了。成功的机会非常渺

茫，但仍然值得一试。我对这个想法有一种奇怪的逻辑。

文森特留在荷兰最后的日子是在尼厄嫩度过的，尼厄嫩是南部的一个村庄，当时他父亲是当地的牧师。我记得在楚波特的书中读到过，当时有一些小男孩会搜集鸟巢给梵高，然后看他画画。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男孩中的一位，皮特·范·霍恩——住在尼厄嫩附近欧布维登的一位磨坊主人，曾经和一位记者谈起过那段经历。那位范·霍恩还可能活着吗？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现在应该已经九十多岁甚至更老了。

回到《荷兰先驱》的办公室，我又去找电话簿——这次我是找尼厄嫩地区的电话簿。电话簿上有一个范·霍恩列在其中。编辑助理劳拉·凯尔德替我拨通了电话。劳拉对接电话的女人解释了我的来由，然后对我说：“肯，她说她是范·霍恩的侄女，皮特还活着，他现在已经98岁了。”

“问问她，他是否还记得文森特·梵高。”我赶忙说。

“是的，”劳拉说，“她说，尽管他已经很老了，但依然很有活力，记性也没问题。”

“他明天愿意见见我，和我聊聊吗？”太好了，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间。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离开了阿姆斯特丹，那天是9月13日。等到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我已经人在乡下了。天空万里无云，一朵云在带着露水的田野上投下了一长片阴影。

我本来计划的是，在前往尼厄嫩的旅途中，顺便拜访一下津德尔特村，那里是梵高出生的地方。津德尔特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一个小教区，距离比利时边境的北布拉班特省大约5英里，我到那里花不到两小时。梵高出生的那座荒凉的屋子，就位于村广场老市政厅正对面。从牧师的住宅走到教堂庭院距离很短——这是一段文森特在孩童时期每周日必经的道路。

靠近墓地大门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小小的墓石，比其他